

#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的现代化

夏振坤 张艳国

传统与现代,既是一对范畴,又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在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如西欧,在16至18世纪,已经解决了这一课题;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如西欧以外各国,则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迁,正在着力解决这一课题。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经济伦理对现代商业精神,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有利还是有弊?学术界讨论热烈,各执一辞。现代派认为,现代化就是告别传统,就是对传统的否定,因而现代化不会借助传统的经济伦理;相反,传统的东西只是历史的惰力,只是一种羁绊。传统派认为,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无不具有自身特色,那些经历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是国粹,因而对现代化是动力,可以推动现代化事业。

我们认为,对于儒家经济伦理所发生的现实作用,不能笼统地、简单地定性为推动或阻碍,也应该贯注“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方法:历史是现实的前提和基础,现实是对历史的扬弃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儒家经济伦理可以对现代化产生动力,但要通过“转化”。

## 一、从方法论上检讨现代派与传统派

现代派也好,传统派也罢,它们在方法论上都将传统与现代绝对对立起来,把它们当成绝对排斥的两极。因而在分析中都以自己的文化本位来讨论现代化出路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缺陷。现代派排斥传统,视传统为惰力,是从西方文化本位角度讨论问题的。当然,资本主义精神对中世纪的战胜,是全面而深刻的,从形式上也是如此。但是,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他们是否全然排斥了传统呢?没有。宗教改革就是例证。经过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精神才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新教对现代化产生了根本的决定性积极作用。新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转换:传统形式+传统的合理内容+现代精神。可见,简单地以西方文化本位讨论中国现代化,是没有出路的,本身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就不能取得圆满解释。而传统派则是从东方文化本位角度考虑的,以民族性对抗普世性,以传统性对抗现代化。固然传统对现代有积极意义,尤其是那些历经世代变迁而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应该注意,那些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内容,本身就有一种对社会变迁的适应能力,在每一时代都具有“现代”的意义。因而经典的、传统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并不可能直接对现实产生助力,那些可能性也是在不断地转换过程中取

得现实性的。如果从传统文化本位角度看,从内容和形式上就无法直接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性,至少从学理上看是如此。

因此,对现代化应作如是观:现代化反映一种文化精神,但不一定从属于东方文化,或者是西方文化。从它产生的原型看来,可能最初打上了一定的文化烙印,但从其现代形态来看,它更多地具有普世性。“现代化不一定就等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不一定绝对是现代化的障碍。”正是从现代化变迁的普世性角度来看的。“现代化是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变为现代的工业文明的一个文明过程,它不单单是经济的增长,而是文化的各个层面的全面转换。西方发展经济学狭隘地只从经济本身来研究现代化问题,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即工业化,把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模式作为唯一的坐标,回避或忽视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文化背景的限制性,对文化传统对现代化的制约——尤其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激烈冲突——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把资本主义框架作为经济发展的既定前提,似乎发展必定要求‘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这正是从文化变迁的现代性角度看的。

因此,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不能从文化本位论出发。如果立足于某一文化本位,必然得出“助力论”或“阻力论”;而应该从两者关系的互动过程论出发,从文化的反作用与现代化的效果出发,促成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换,就能产生积极作用。考察儒家经济伦理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也是如此。

## 二、从理论上探讨儒家经济伦理向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1. 理论上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伦理道德形式、体系,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具有历史的形式和内容,这是由该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该时代的伦理道德一经形成,就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首先它表现为思想上的独立形态,取得了自身发展的独立形式。恩格斯指出:“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已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

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正是因为经济伦理有自身独立发展的形式，因而它可能随着世代变迁而保存下来。其次，这种历史的传承性，总不会是被动的，而是采取反作用形式与时俱进。这就是它的能动性。在《共产党宣言》中，经典作家指出：“人们的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恩格斯进一步分析道：“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社会历史由中世纪向现代化跃迁，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经济伦理也能不断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获得新的内容，通向现代化。

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社会意识的传承性来看，传统的经济伦理可以转化成现代化的动力。任何时代的经济文化建设，总是基于既定的历史条件，以现有的材料为基础，不可能凭空拔地而起，因此，必须尊重历史，善于继承创新。列宁分析道：“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否认中国的历史文化可以通向现代化，无疑是将洗澡水同婴儿一同泼掉，必然抹煞中国现代化的民族特性。当然，儒家经济伦理对中国现代化产生助力，也是有条件的。这就需要我们善于运用正确的文化方法剥离历史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化腐朽为神奇。

2. 方法论的分析。对待儒家经济伦理，总的态度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具体地说，就是“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认真钻研是前提和基础，吸收和融化是中介，发展是旨归，是要求和目的。认真钻研是为了弄清历史文化的历史性与现代价值；吸收和融化是为了吸取营养，丰富文化内容；发展是为了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基于历史主义的辩证方法，讨论儒家经济伦理同现代化的关系，应立足于四个层面。第一层次，原型文化母体与现代化的关系。这是属于“基因”与“人体”的关系，二者不是相等的关系。文化母体对现代化进程快慢的影响，除了本身的因素外，还要决定于经济、社会方面的背景，而且是一方面（尤其

是社会制度）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第二层次，任何一种文化母体，对现代化来说，都有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只是在比例上存在谁多谁少的差别。对于精华内容来说，是否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还要看历史发展所提供的机遇，我们常说的“亚洲四小龙”就是先有“机遇”然后才发生文化的重塑，最后才出现了东方现代化模式。第三层次，即使是“精华”原体，也不是现代化本身，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延伸、蜕变而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第四层次，即使是历史上曾经表现为“糟粕”的文化内容，也不必全盘否定，在“精华”的主体地位确定之后，将“糟粕”加以改变变形，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其有利于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例如，在中国儒家思想中，“乐天安命”思想，从总体上无疑不利于积极进取，但在社会矛盾剧烈化时，运用得体，却可缓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稳定，为社会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

总之，要实现儒家经济伦理同现代化的对接，就要按照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实现儒家经济伦理的价值剥离，经过改造制作，使之焕发现代化的生机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黄光国、成中英等人的主张，——原型的儒家文化固然不是现代化的直接动因，但其中所固有的某种理性层面，通过现代化的转化，则可以成为现代化的直接动因，——是有积极意义的。

### 三、儒家经济伦理造成中国现代化动力的可行性

从“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经验来看，历史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激活后，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动力。以日本的现代化模式为代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实现现代化的转化后，就成为现代文化的有机成份和重要内容。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在透视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化意义时颇有见地说：“当代的日本人，显然已不再是德川时代他们的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教门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孔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孔教或许比任何其他传统宗教或哲学对他们的影响都更大”；“日本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现代科学、有关进步和发展的现代化观念、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民主思想及其社会准则等等，但在这个表层之下，强烈的孔教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诸如相信政府的道德基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忠诚、热衷教育和勤奋工作等等。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孔教徒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孔教徒。”<sup>40</sup>

从儒家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来看，其造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是具有现实的可行性的。

#### 1. 重义轻利

在孔子思想中，一方面主张“富民”，重视老百姓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道德与个人修养，主张把道义放在首位，重义轻利。《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君子谋

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直接继承了“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孟子》开篇所载就是孟子的“义利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sup>41</sup>不仅王者不该见利忘义，就连老百姓也不能舍义逐利：“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相泣者，几希矣。”<sup>42</sup>孔孟以后，重义利之辨的思想，成为中化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中的一条基本准则：“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sup>43</sup>成为千百年来的不变古训。

从历史的眼光看，“利”是永恒不变的，“义”则是周变不息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义”。但是，从原则角度看，同“利”相对应的“义”的价值范畴，却总是存在的，并且高于“利”的价值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方面要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引导，以“义”去支配“利”。这就是兼固义利，以义驭利的经济伦理原则。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sup>44</sup>，个人利益必须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相一致；否则，两者都会遭受损失。如果抛弃了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利”的毫无意义了。因此，在原则问题上，“义”必须服从“利”：“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sup>45</sup>可见，“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经过文化转化，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

## 2. 诚信无欺

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将“信”当成人的立身之本，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当然，“信”的价值范畴是服从和服务于孔子所宣扬的“仁”、“义”的。《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主忠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诚信乃立身之本，在经济生活中，诚信是根本的原则。

儒家经济伦理的诚信无欺原则，直接通向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马克斯·韦伯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认为诚信原则是资本主义伦理中最重要的思想原则，他在分析中详征美国早期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关于诚信的论述：“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敢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在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们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认为“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sup>46</sup>。诚信原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信用理论的形成，乃至信用制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它在诸如信用的作用、信用的创造与信用的限度、信用与货币流通速度、纸币与信用券、信用与物质、利率与信用的利用等方面都有体现。

在东方，诚信原则在经济生活中的活力也表现得十分突

出。在韩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几乎随处可见诚信原则对于焕发经济活力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同韩国政府着力在社会生活领域贯注诚信原则，是密不可分的。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曾大力宣扬诚信原则，力图使之成为国民生活的价值原则。他说：“必须建立共同的思想、判断和行为准则，使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在相互信任和爱之中。政府官员必须重新遵守为公民服务的道德准则，企业家和工业家必须全力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在一切交易和交往中必须重新奉行诚实的品德。”<sup>47</sup>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已经把诚信原则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已经认识到它对于现代国民精神重塑的重要价值。从它本身的价值合理性与外国经验严看，它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起助力作用。鼓励以诚实的劳动获得财富，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等等，就是对这一价值原则的贯彻。

## 3. 均贫富

孔子主张建设一个理想社会，除了在文化上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外，还必须重视经济生活领域的贫富差距。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孔子认为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心理就是：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老百姓而言，贫富均匀，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平衡，达到社会安定。《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均贫富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一种理想社会目标。孔子之后的《礼记·礼运》发展了这一思想，主张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均贫富，就是要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确立公正与公平的价值原则。

虽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平均主义同竞争相背反，但是，即令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崇尚竞争精神，但也需要以公平竞争和社会分配的公正作为补偿和调节器。如果剥夺了这一价值原则，必然会带来病态竞争，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平均主义泛滥，社会经济生活无活力可言，但极端竞争行为，必须导致社会动荡。因此，融合两极，互相补充，经济生活才会有活力，有生机。这一点，无论是在先发还是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是有清醒认识的。以亚洲首富日本为例：日本前首相福田赴夫一直将“社会的公平”作为政治的中心内容，他认为通货膨胀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通货膨胀会扩大“社会的不公平”，会动摇社会、经济安定的基础<sup>48</sup>；中曾根康弘强调：“发达的社会，首先是公正的社会”，而大平正芳则呼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公正的、有风格的日本式福利社会”<sup>49</sup>。由此可见，均贫富的价值主张，对于激励的商业竞争是一道有力的调节杠杆，可以使社会不致放弃人文精神支撑作用，保持一种社会的理性伸张力。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有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以共同富裕目标和手段达致“均贫富”的社会要求。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

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sup>[40]</sup>可见，均贫富的经济伦理原则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还是有生命力的，只不过其内容和手段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贯注了时代精神，从而在新时代有新的作为。

总之，不能抽象地讨论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意义。任何一种文化内容，离开了原有的文化土壤，都会有新的变化。要使之产生新的社会作用，必须因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精神进行转化，才可能赋予新的意义。对于现代化来说，儒家经济伦理也是如此。儒家经济伦理的合理的价值原则，只为我们提供了利用它的可能性，只是一种有益的文化源头，而要使之具有现代意义，必须发掘其中的现代性价值，从而实现文化的创新，使之具有新的文化功能和社会意义。这样，它才能对社会现代化产生积极作用。如果仅仅局限于儒家经济伦理的原典意义来讨论其现代性，无疑会造成机械的文化观。

#### 注释：

《夏振坤选集》，17、168~169、178~17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501、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347~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毛泽东选集》，第2卷，533~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184、175~176、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 [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中文版，23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1 《孟子·梁惠王上》。

12 《孟子·离娄下》。

13 《汉书·董仲舒传》。

16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33~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7 18 19 转引自姚鹏等主编：《东方思想宝库》，997、1174、101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 430077)

(责任编辑：曾国安)

(上接第42页) (柔性化) 的趋势。因此，产业组织理论中原有的企业行为分析和规模经济理论，必须根据知识经济的新特点予以改善。在工业经济时代，市场竞争会形成垄断，垄断会引起生产和技术停滞的趋势，会使消费者遭受损害。但是，在知识经济中垄断的性质和作用将发生重大变化。知识经济意味着知识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新知识的发现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产品的开发者，在初期处于垄断地位，可以获得高额垄断收入，这有助于激励人们去发明创造，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由于知识更新加快，新技术开发周期缩短，使得产品换代加速，新科技很难长期垄断。所以，知识经济中的垄断一般不会带来生产和技术的停滞、阻碍产品的升级换代、减少消费者的福利。现在，电脑公司、软件公司不断自动地淘汰自己的产品，降低产品的价格，就是典型的例证。当然，如果较长时期的垄断，也会妨碍新技术的推广、知识的共享。因此，在知识经济中，既要在法律上保护知识产权，承认新知识、新技术的垄断性，又要规定一个保护期，避免长期垄断的弊端。所以，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市场结构、竞争与垄断的分析，也需要根据知识经济的新情况加以充实。

4. 产业发展理论需要创新。由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自然资源，必然会耗竭资源、牺牲环境；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存在增长的极限；主要靠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来发展的工业经济，在达到最佳规模之前是收益递增，但之后则会出现收益递减，还会存在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所以，物质经济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由于知识经济主要依靠的智力资源具

有丰富性、可再生性，其发展不存在极限；知识越使用价值越大，存在收益递增趋势；科学的迅速发展，创新的步伐加快，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缩短，会大大缓解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知识经济不仅能高效利用现有的稀缺资源，而且能开发新的富有资源，高新技术本身又包括环保技术，能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所以，知识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产业发展理论必须根据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特征进行创新，研究知识经济时代可持续发展中的产业发展。

#### 注释：

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5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于立、王询：《当代西方产业组织学》，4页，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史忠良主编：《产业经济学》，3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杨公仆、夏大慰：《产业经济学教程》，1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杨德明：《西方经济学》，635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87。

[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文版，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商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刘传江)